

現代智庫的功能變革與澳門智庫建設

于茗卉* 郝雨凡**

縱觀 20 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國際環境風雲變幻、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科學技術日益突進，也促使作為政府政策諮詢機構的智庫走上了現代化改革的道路。現代智庫，不僅僅發揮着傳統智庫的功能，即政策諮詢和知識傳播，也開始積極向外拓展，尋求智庫外交和國際話語權等延伸性功能的發揮。

澳門智庫，是在國家政策支援、區域發展機遇和自身發展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下共同促進成長起來的機構，擁有現代智庫所應具備的特徵和功能。一直以來，澳門智庫積極發揮“頭腦”的引領作用，協助澳門政府在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繁榮等方面提供科學決策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國內外一流智庫相比，澳門智庫的發展尚存在不小的差距，出現了由於定位不清晰而導致的功能發揮受限，其漫漫變革發展之路仍任重道遠。

近年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兩大國家級發展戰略的契機下，澳門特區積極投身於區域性和國家性綜合發展規劃中，澳門智庫也迎來了智庫外交功能拓展的最佳轉型期。澳門智庫應當加快其發展變革之路，拓展學界與政府之間的雙向溝通軌道，積極拓展其智庫外交功能，加快建設一批具有引領意義的、澳門品牌國際峰會，提升澳門的國際影響力，以協助澳門特區實現區域性、國際性的發展定位，提升澳門的國際影響力。

*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澳門大學博士生。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院長講席教授。

一、現代諮詢決策中的智庫功能轉變與拓展

在 20 世紀初的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美國的進步運動者認為科學、技術、專業是諸多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並相信專家在解決社會問題當中的能力。對此，他們要求在各個領域推進高效運動，其核心即為科學管理，支持將科學方法運用於經濟、醫療、教育、政府等諸多方面。¹ 受到當時進步主義（Progressive Era）思潮的影響，少數慈善家以完全服務公共利益為名義，建立了一些私人研究機構，以期望解決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 1910 年，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成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1916 年，羅伯特·S·布魯金斯（Robert S. Brookings）成立的布魯金斯政府研究所（後在 1927 年與經濟研究所和羅伯特布魯金斯學會合併成立布魯金斯學會），這也是世界範圍內第一代現代智庫。

智庫一詞，最早來源於 20 世紀 40 年代美軍討論戰略和作戰計劃的保密室（Think box），也常被稱為“思想庫”（Think Tank）。嚴格意義來說，智庫應當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獨立性和自由度，以區分於政府和大型利益集團；二是實踐性和落地性，以區分於一般學術研究機構。基於此，學界對智庫概念的認識也形成了基本共識：“一種獨立的、不以利益為基礎的、非營利的組織，依靠專家及其思想獲得支持，並對公共決策過程產生影響”。² 自 20 世紀初算起，現代智庫的發展經歷了百年歷史，至少有四個較為明顯的發展階段，並產生了與此對應的四代智庫，³ 即政策研究機構（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政府合同型智庫（Government Contractors Think Tanks）、宣導型智庫（Advocacy Think Tanks）和名流型智庫（Legacy-based Think Tan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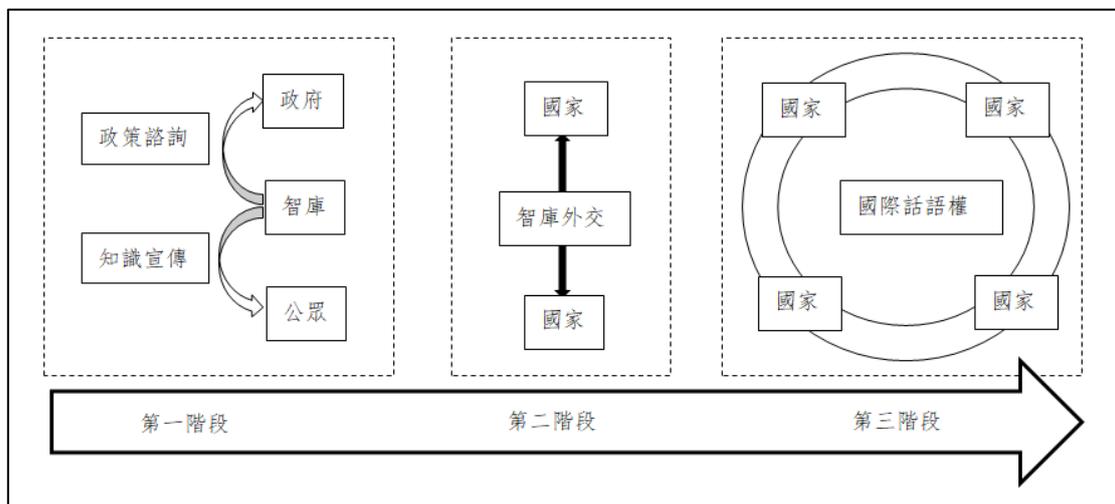
¹ 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1998)

² Andrew Rich (2004).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

³ 智庫的發展階段並未有定論。目前較為普遍採用的是加拿大智庫研究專家唐納德·E·亞伯森（Donald E. Abelson）所劃分的“四波浪潮”和與此對應的“四代智庫”。

經歷近百年的發展，現代智庫正在積極探尋其在地區、國家乃至全球化進程中的廣闊思想者地位，成為歷次工業革命、社會轉向、政治變革中最具競爭性的“產業”，其內涵和功能的拓展已經遠遠超越最早的設置。簡單來說，現代智庫的功能衍變共經歷過三個階段，從第一階段以政策諮詢和知識宣傳為主，到第二階段的智庫外交，並逐步向第三階段的國際話語權上進行轉變。

圖 1 現代智庫的功能衍變



第一階段：政策諮詢功能和知識宣傳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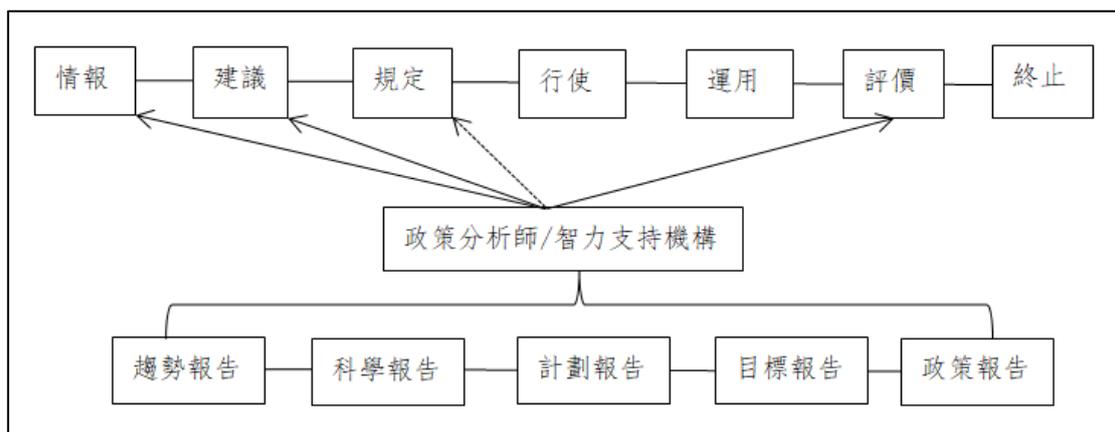
政策研究和政策諮詢是智庫最基本、最傳統，也是最主要的功能。早在 20 世紀初，政府開始逐步失去其在公共決策中曾經佔據的絕對甚至是唯一的地位，各領域的專家開始參與到公開性的辯論和政策制定中，這也導致了該時期衍生了大量的政策研究機構，智庫也應運而生。智庫，作為思想庫，是由大量的學術界、業界專家組成，通過對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這些建議和意見都具有一定的可選擇性、現實和可行性。智庫從功能上“是政策團體為確保多樣化、開放性和政策分析、研究、決策以及評估過程的可靠性，以知識和智力為基礎而提供的軟基礎設施”。⁴ 詹姆斯·麥甘更是提出，智庫“不應只是按照政府的需要來做工作，而應該幫

⁴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TA's World Directory of Think Tanks, p. ix.

助政府思考，提供有價值的建議，為政府所可能會面臨的挑戰提供關鍵的思想支援”。⁵

拉斯韋爾最早提出智庫和政策研究人員應當如何參與政策決策，以及重要的參政途徑。在《決策研究的技巧》一書中，拉斯韋爾創造性地提出政策過程的七功能理論，即情報、建議、規定、行使、運用、評價和終止。這七大功能明確的定義了學界的定位為決策者的智力支持機構，即在決策前，通過趨勢報告、科學報告、計劃報告、目標報告和政策報告等為決策者提供資訊和輔助性服務。⁶

圖 2 政策過程七功能理論



作者自製。原始來源：Lasswell, H. D. (1960). Technique of decision seminar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213-236.

在對政策決策產生影響的過程中，現代智庫在積極發揮對政府政策決策的直接影響的同時，也開始尋求其對其的間接影響，即面向大眾而拓展的知識宣傳功能。一般來說，知識宣傳是現代智庫用以增加自身影響力，從而增加對政策決策的影響的一種重要方式。智庫通過互聯網、電視媒體等宣傳

⁵ 徐方清、詹姆斯·麥甘：“如何成為頂級智庫”，參見 <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788.html>，2014年8月20日。

⁶ Lasswell, H. D. (1960), “Technique of decision seminar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213-236.

途徑，將研究成果對公眾、社會大眾層面進行廣泛傳播和推廣，一方面達到政策啓蒙、知識傳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在某類政策上達到政策輿論宣傳，推動公眾輿論，以最終達到政策影響的目的。智庫知識普及的作用在資訊化發展的今天體現的更為重要。互聯網快速發展帶來了資訊知識爆棚的出現，也使得諸多真假資訊摻雜，普通民眾根本無法從諸多的資訊中判斷真偽，從而做出個人判斷。智庫，基於自身學術研究、科學方法論等豐富的經驗，深度剖析政策背景，解讀政策文件，也不失為知識經濟時代中一種積極的大眾參與行為。同時，某些智庫在政策輿論宣傳層面則更多充當的是政府代理人，是受到政府的支持，實際上從事的是政策背書的工作。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智庫則成為政黨或者政治派別來進行政治思想推廣和宣傳的重要平台。

第二階段：智庫外交功能

外交（diplomacy）是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的，一般被認為是管理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國家政府部門，尤其是外交部，是傳統意義上外交的主要參與者，專門負責處理國家間事務。隨着全球化發展，包括公民社會在內的外交主體也開始逐步參與到外交事務當中，而智庫則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參與力量。現代智庫在國家外交事務當中的參與，進一步拓展了其外交功能，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知識外交（**knowledge diplomacy**）。知識外交是新型外交中的一種，其最早是出現在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間的智慧財產權談判。目前，對於知識外交最常用的界定，是通過高等教育、研究和創新機構（**IHERI,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來建立和加強國家之間的關係。⁷ 但是，與教育外交、文化外交不同的是，知識外交強調的是其知識性、專業性，這就明確了智庫是重要的參與主體。在智庫外交中，智庫通常不直接參與任何具體的外交事件，而主要是通過理念知識分享的方式來推動國家間在某項具體事務上的合作。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成立於 2012 年的 **RENKEI (Japan-UK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 for Knowledge**

⁷ Kn Knight, J (2018) *Knowledge Diplomacy. The way forward?* Discussion paper. London: British Council.

Economy Initiatives)。早在 2010 年，日本和英國就明確了大學之間的合作是加強兩國關係的一項關鍵戰略措施。在該年英國大臣訪日期間，就宣佈了一系列即將舉行的旨在加強兩國大學國際化和研究合作的對話。⁸ 在此號召之下，諸多高校和科研機構明確提出建設跨國科研合作網路，即 RENKEI。自其建立起，RENKEI 就明確提出要通過在重大社會問題上建立學術－產業聯合研究活動，來加強兩國之間關係為目標的科研機構。截止目前，RENKEI 網絡包括日本的六所大學、英國的八所大學以及數十個來自業界的研​​究合作夥伴，重點在可持續能源、戰爭、航空航太工程等領域聯合開展研究項目、研討會等。

第二種是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或秘密外交（**Backchannel diplomacy**）。二軌外交是相對於政府之間、官方的、正式的一軌外交而言，主要是指由個體公民或群體參與的非政府間、非正式、非官方的活動，⁹ 旨在國家間尋找衝突解決或建立友好對話的機會。在正式外交當中，外交官一般代表國家的官方立場，措辭相對較為謹慎，這就有可能導致交流不通暢等現象的出現。1991 年 Volkan、Montville、Julius 等人提出第二軌道外交活動，以非官方的形式來發展收集、交換、積累知識、探索政策與解決問題。¹⁰ 具體而言，二軌外交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夥伴將兩方非官方代表聚集在一起，在充分的意見交換和信任建立後，再邀請各方代表以私人身份參加，以促使第二軌道和第一軌道接觸。在這個過程中，智庫，或重要的政策參與者，已經開始成為二軌外交當中的第三方代表力量。智庫參與二軌外交的重要案例是成立於 1958 年的國際戰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目前，國際戰略研究所有三個重要功能：資訊收集(facts)、分析 (analysis) 和影響力 (influence)，其中影響力即為其開展二軌外交的重要著力點。該研究所是國際上著名的安全峰會的組織者，每年舉行一次“阿拉斯塔爾·巴肯紀念講座”，彙集各國政府部長、商界人士、政策分析師和

⁸ Disponível em :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41154/Japan-UK_Joint_Declaration_on_Prosperty_Cooperation.pdf

⁹ Davidson W. D., J. V. Montville,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Freud", In *Foreign Policy*, Vol. 45, Winter 1981–1982.

¹⁰ Saunders, (1991) Officials and Citize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V. Volkan, J. Montville and D. Julius (eds.), pp.41-69.

媒體等，通過討論會、學術研討會等方式來為國家間國防和安全合作尋求新途徑。

第三階段：建立學科權威，掌握國際話語權

建立國際話語權是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當中，智庫所呈現的新功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智庫外交拓展的更高階功能。現代智庫，通過在某一個學科領域上展示充分的專業性、科學性（這可以通過學科建設、只是人才彙聚或與政府某部門的關聯來達到），正在試圖搭建的是區域性的、跨國別的學術權威性，甚至是國際層面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實際上就是一種“話語權”，被任曉認定為立法、行政、司法、媒體四權之後的“第五種權力”。¹¹

可以說，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的今天，高水準、國際化的智庫不僅可以憑藉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設置戰略議程，設計和引領國際議題的走勢，影響國際行為體和國際公眾對某項戰略議程的認知理解和重視程度，進而服務本國政治；而其還可以憑藉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引領國際思潮，制定理論範式，將全球主流思想歸納到自己的框架中來，使自己成為全球思想的主導者。¹²

二、澳門智庫的發展現狀及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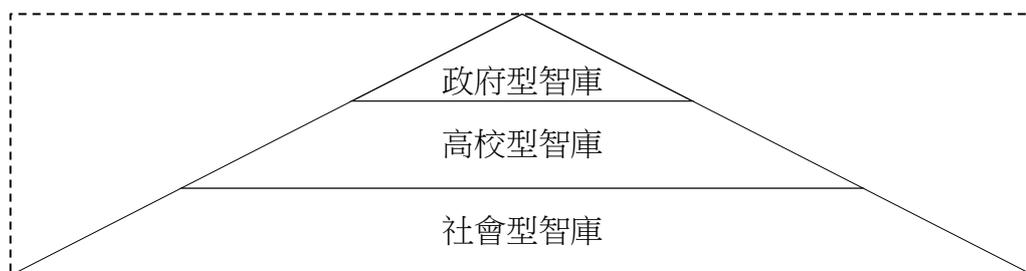
自 1990 年澳門經濟學會成立以來，澳門智庫建設也有近 30 年的歷史。在短暫的 30 年發展歷程中，澳門智庫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形成了結合中國智庫建設經驗和澳門特區獨特發展特色的澳門智庫。尤其是近年來，澳門智庫建設與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緊密結合，在智庫人才培養和吸引、政策資金和社會資本等多領域下重筆，形成了政府型智庫、高校型智庫和社會型智庫等多類型、多層次的智庫體系，成為澳門特區諮政啟民、人文交流和特區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

¹¹ 任曉：《第五種權力：論智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

¹² 丁開傑：“提升國際軟實力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核心任務”，《前綫》2015 年第 10 期。

目前，澳門智庫體系呈現明顯的類別特徵，即政府型智庫、高校型智庫和社會型智庫三個類別，且從數量上呈現典型的金字塔結構。其中，政府型智庫數量較少，僅有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和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所兩家，成為澳門智庫的引領性智庫。高校型智庫目前有七家，主要分佈在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是澳門智庫體系的中流砥柱。社會型智庫數量最多，短短 30 年間即發展了 20 多家，成為澳門智庫體系的堅實支柱。

圖 3 澳門智庫體系金字塔結構分佈



從現狀上來看，澳門三個類型的智庫發展各有特色：第一，以澳門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為代表的政府型智庫，是隸屬於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研究機構，使用政府財政資金，研究人員屬於政府僱員，這在人力和財力上保證了該類型研究機構的穩定。從研究方向上來看，政府型研究機構較多從事具有現實意義的政策研究，且具備開展大規模社會、人口、經濟普查的實力。第二，澳門高校型智庫是從屬於澳門各大高等院校的智庫，學術研究實力較為雄厚，研究人員也相對固定，往往可以開展理論建構等層面的研究。高校型智庫資金來源上是部份來源於政府撥款，部份來源於高校專案經費，穩定性是介於政府型智庫和社會型智庫之間，學術自由度也介於二者之間，往往是基於自身已有的學術資源和項目具體要求來進行選擇。第三，社會型智庫則是澳門特區建立以來最為蓬勃發展的一支力量，在短短 30 年中落地了 20 多家有政策研究實力的機構，且在政府課題承接、學術研究開展、公共利益改進等方面正在不遺餘力做推進。由於財源相對不穩定，報送管道也不穩

定，這就給社會型智庫的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造成該類型智庫發展現狀參差不齊。

表 1 澳門特區各類別智庫特徵

	政府型智庫	高校型智庫	社會型智庫
研究人員	固定	半固定	半固定/不固定
獨立性	附屬政府	附屬高校	獨立
學術性	一般	強	弱
自由度	較弱	一般	較高
報送管道	穩定	部份擁有	不穩定
資金來源	充足、穩定	一般	不穩定
激勵機制	較差	一般	一般
典型案例	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 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所	澳門研究中心 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葡語國家研究院 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 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澳門政策研究所 澳門經濟學會 群力智庫 民聯智庫 思路智庫

來源：作者自製。

目前，澳門智庫在諸多領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績：1) 提交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政策報告和學術研究，其中以政府型智庫和高校型智庫最為突出，會就澳門特區當下面臨的問題展開大規模調研和諮詢工作，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報告，例如 2018 年特區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的《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度》公開諮詢總結報告等；2) 建設了一批相關學科和研究基地，其中以高校型智庫為重點。目前，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均開設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類碩士和博士專案，澳門理工學院開設公共政策博士學位，均用以培養公共政策研究和政策諮詢等相關人

才。此外，澳門高校也籌建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門學研究中心、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澳門智慧財產權研究中心、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等諸多研究基地，在相關領域進行深入探討；3) 出版了一系列學術刊物、文庫、書籍，並積極建設澳門資料庫。其中，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澳門旅遊休閒發展報告》（《澳門綠皮書》）、《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中葡經貿藍皮書》）、《澳門文獻叢刊》、《澳門學研究》、《澳門海洋研究》等皮書、叢書與集刊。目前，澳門智庫在學術科研、政策諮詢上正在發揮積極作用，也採用不定時的公開講座、國際會議等向社會大眾進行知識傳播，在傳統智庫功能發揮上保持穩定的態勢。

近年來，隨着澳門智庫的快速擴張式發展，大眾對其的質疑也逐步顯現。辯證的來看，澳門智庫連續發展了 30 年，接下來是否有必要再進行擴張式發展？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澳門社會發展對智庫需求較小。澳門是中國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對外而言，其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務是由中央政府負責，對內而言，其經濟結構長期都以博彩業為主，這就決定了澳門政府對於智庫智力的需求，是多以經濟、社會、民生、文化等領域為主，且在一定時期內都較為穩定。這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澳門智庫研究多為歷史研究或澳門現實發展研究，是基於政策分析和經驗總結而做出的政策評估和判斷，而並未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性的前沿研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澳門智庫是否還有持續發展的勁頭？澳門智庫存在着明顯的“智”力資源不足，這嚴重制約了澳門智庫的後續發展。目前，澳門特區共擁有 10 所高等院校，共擁有 5170 名工作人員，其中教學人員 2303 人（佔比 45.86%），研究人員 483 名（佔比 9.62%）。這與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相對充足的高等教育資源基本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在這短短三十年的時間內，澳門智庫在數量上的快速增長早已滿足了澳門特區對智庫的需求，也面臨着後續支撐力不足的問題。

三、澳門智庫變革之路

在過去 30 年的發展之中，澳門智庫快速發展，已形成了分類型、分層次的澳門特有智庫體系，也為澳門特區的發展建設提供了諸多智力支援。目前，澳門智庫發展處於平穩期，也面臨着未來發展的瓶頸期。澳門智庫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未來何去何從？時至今日，澳門智庫應回歸於澳門特區的發展需要，在“澳門所需、智庫所長”中做重新定位和功能轉型。2018 年 11 月，澳門特區政府發佈名為《把握機遇 均衡發展》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其中澳門的發展機遇即是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兩個國家級戰略。對此，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三大定位也非常清晰，積極將自身發展融入到區域、國家發展中，且積極承擔中國“走出去”和“引進來”超級聯絡人的責任。澳門所需，是如何做好超級聯絡人，這也開啓了澳門智庫的發展變革之路。

表 2 智庫話語權的來源

	影響本國決策	影響他國決策	塑造國際議程
政策供給	為本國政府提供政策選項、政策建議或政策評估	為他國政府提供政策選項、政策建議或政策評估	為國際組織提供政策選項、政策建議或政策評估； 國際公共政策的議題設定
理論供給	提供指導，詮釋本國外交政策的理論、概念	提供界定雙邊關係的理論和概念； 提供解釋他國問題的理論和概念	提供全球、區域治理的理論、概念、議題
人才供給	為本國政府外交人才； 培訓外交官員； 聘請前政要	培訓外國公職人員； 聘請外國政要	培訓國際公務員； 輸送國際公務員； 聘請政要

平台供給	外交政策對話平台 (會議、論壇、期刊等)	舉行二軌對話； 參與雙邊政府間對話； 設置海外分支機構	辦國際議題的對話、論壇、會議； 與國際組織合作舉辦對話、論壇、會議
輿論供給	對國內社會闡釋政府外交政策； 通過政策辯論影響或塑造本國政府決策	對外國社會闡釋本國外交政策； 參與國家形象塑造； 動員外交社會對其政府決策施壓	向社會闡釋國際議程或國際組織的政策； 動員社會向國際議程、國際組織施壓

來源：張驥、方炯升：“中國外交安全智庫國際話語權分析”，載於《國際展望》2018年第5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張驥¹³等在分析中國外交安全智庫如何建立國際話語權中，認定智庫國際話語權的建立，通常是通過幾個層面，其一是政策研究、政策建議和政策評估，這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其二是重大理論構建，這種時間較長，但一旦成功是會產生比單一政策更為深遠和重大的影響；其三是“旋轉門”機制，把智庫人才看做未來決策者的儲備池；其四是通過會議、講座等形式來搭建政策對話平台；其五是製造和引導國際輿論。基於此，澳門智庫體系功能的轉型，可以在決策影響和塑造國際議程上做突破。具體而言，澳門智庫體系建設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加強澳門智庫的人才培養，推動智庫專業化、國家化水準的提升

智庫，突出的是“智”，就決定了具有科學知識、專業技能、政策意識的智庫型人才是其核心競爭力。長期以來，西方智庫就極為重視公共政策分析人才的培養，專門開設了公共政策碩士或博士課程，以應對社會發展對政策科學的需求。例如哈佛甘乃迪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等，都是專業的政策分析人才培養基地。

澳門特區應當加強自身智庫人才培養建設，在高等院校中設立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碩士項目，重點培養其在公共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等一系列

¹³ 張驥、方炯升：“中國外交安全智庫國際話語權分析”，《國際展望》2018年第5期。

專業能力；設立短期、兼職性公共政策分析培訓課程，尤其是加強來自“一帶一路”沿綫國家、葡語系國家中的公務人員培訓，一方面可以加強諸多國家間在制度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民生等領域的經驗交流，另一方面也可增強澳門智庫的國際化水準，提高澳門特區的國際影響力。

同時，澳門特區應當進一步優化政府與智庫之間的人才交流機制，支持和鼓勵退休官員參與智庫工作，以提升澳門智庫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增加智庫專家到政府相關部門調研、考察或掛職鍛煉等機會，加強智庫人才對政府實際工作的深刻認識，以促使公共政策設計與執行之間銜接的更緊密。

（二）加強地區性、區域性的政策供給，加強澳門學理論建構，推動研究議程的轉型升級

第一、澳門應當著力搭建和拓寬政府與智庫之間多元化的政策管道，支持和鼓勵高校型智庫、社會型智庫參與具有現實指引作用的政策報告產生。對於重大事件，澳門特區政府應當積極主動通過公開招標、定向委托、專家諮詢等多種形式，將智庫納入到制度化的政策決策過程中來。

第二、澳門智庫應當依托於高等院校的專業化人才，創造條件鼓勵開展基礎研究、理論研究、前瞻性研究，推動澳門研究向澳門學的學理框架拓展，提升澳門學在現代國際關係、全球文明對話中的理論建構，加強戰略研究，加強澳門學在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和其他國際實踐中的闡釋、指導能力。

第三、澳門智庫應當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兩個國家戰略，積極推動澳門學在現有重要區域性、跨國家間和國際化議題上的拓展，並加強區域性的政策供給，以推動澳門智庫向國際化智庫的邁進。

（三）積極推動澳門智庫外交的開展，全面加強“一帶一路”沿綫話語能力建設

第一，澳門智庫應當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優勢和制度優勢，定期舉辦國際會議、國際高峰論壇、國際論壇等，提升跨國智庫對話平台的品質，

集中打造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高端對話品牌，打造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對話平台。一方面彙聚多方智者，為澳門發展出謀劃策，另一方面也可帶動人文交流全面繁榮發展，為“一帶一路”建設打造良好民意基礎和營造社會氛圍。

第二、澳門應當鼓勵本地智庫積極參與本地性、區域性或國際性重大問題研究，鼓勵澳門智庫以個體或者抱團的形式與內地智庫、海外智庫進行智庫聯盟、智庫網絡、智庫聯合體等建設，以增強智庫之間的資源整合能力，實現優勢互補、相互激發，並著重智庫成果推廣傳播等，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

四、結語

西方現代智庫功能的轉變，無疑體現了智庫作為思想庫，在政府政策諮詢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均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澳門特區智庫建設也毫不例外。未來，澳門智庫變革之路的關鍵，已經不僅僅是在如何發揮澳門智庫在科學決策中“頭腦”的引領作用，而更重要的是積極拓展澳門智庫外交、掌握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的功能。澳門應當發揮在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區位和制度優勢，積極承辦短期官員培訓等項目，擴大政策概念影響力。澳門也應立足於會展業的既有優勢，集中開辦由澳門智庫主導的國際峰會、國際會議等，在文明對話、中葡發展等多領域打造澳門智庫品牌，發揮澳門智庫地區性、區域性乃至國際性影響力。